

我的父亲顾随

之京



父亲去世至今已经二十一个年头了。父亲的一生是在读书、讲学、创作、著述中度过的。十年动乱时，父亲虽已亡故六年，也未能幸免。他一生心血凝聚而成的全部著述、大量未及发表的手稿毁于一旦，连日记、来往信件也被搜索一空，

以致今日要为他写一点类似传略的东西，都感到无从落笔。但是，他留在友人、学生、女儿们记忆中的印象却是不会磨灭的，就以这些音容宛在的印象和尚能搜集到的材料，试着写一写父亲的一生吧！

—

一八九七年二月十三日，农历丁酉年（清光绪二十三年）的正月十二日，父亲出生在河北省南部大平原上的一个小县份——清河，取名顾宝随。

我的祖父是前清的秀才，父亲刚会说话的时候，我的祖父就教他背唐诗；五岁时，祖父又带他进家塾读书，而塾师也就是我的祖父。父亲后来回忆说：

自吾始能言，先君子即于枕上口授唐人五言四句，令哦之以代儿歌。至七岁，从师读书已年余矣。（《稼轩词说》卷首）

幼年时代的父亲，在严父加严师的教诲下，攻读古文、古诗。父亲不仅每天要念、抄、背，而且要回讲，要写文言文，到八岁的时候，他已能写出三、五百字的通顺的文言文了。祖父对他课业的要求十分严格，如果完成得不好，就要受到责打。这一番苦读为他后来的研究、著述、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父亲的童年也并非暗淡乏味的。他从小就对我国古典诗歌有着特殊的爱好和感受，因此每晚听祖父讲授唐诗，就成为他最大的乐趣和享受。有时候，一两句古诗竟会像童话里的魔杖一样，在他眼前点出一个幻境来。父亲曾记述过七岁时读杜诗而有所领悟的情景：

会先妣归宁，先君子恐废吾读，靳不使从，每夜为讲授旧所成诵之诗一、二章。一夕，理老杜《题诸葛武侯祠》诗，方曼声长吟“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案上灯光摇摇颤动者久之，乃挺起而为穗。吾忽觉屋室墙宇俱化去无有，而吾身乃在空山中草木莽苍里也。故乡为大平原，南北亘千余里，东西亦广数百里，其他则列御寇所谓“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者也。山也者，尔时在吾，亦只于纸上识其字，画图中见其形而已。先君子见吾形神有异，诘其故，吾略通所感，先君子微笑，已而不语者久之，是夕遂竟罢讲归寝。（《稼轩词说》卷首）

在对古代典籍和古代诗词的研读中，父亲度过了他的幼年。一九〇七年父亲十一岁的时候，考进清河县城高等小学堂。在那里，他对中外历史、地理开始产生兴趣。一九一〇年父亲考进广平府（永年县）中学堂，他以浓厚的兴趣刻苦学习文学、历史，但对数、理、化三门都不感兴趣。直到晚年，他有时还真诚而幽默地自嘲说：“我不识数。”

一九一五年，父亲十八岁，怀着对新思想新知识的渴求，辞别了教诲他的祖父，离开了养育他的故乡，考入天津北洋大学，一九一七年又奔向文化古城北京，转入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英文

门(系)。在这里，他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这时候，他已改名为顾随，字羨季，后又取别号为苦水。

一九二〇年父亲以优异成绩结束了他在北京大学英文门的全部课业，结束了他求学的生活，取得文学士学位，开始走向社会。

二

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九这十年间，父亲在山东、河北、天津的一些中学任课，教授英语和国文。自一九二九年起，父亲开始到大学工作，此后三十年，他始终没有离开大学的讲坛。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四一年，父亲在燕京大学执教，先任讲师，不久提升为教授，同时还在北平大学、北京大学、中法大学等校兼课。一九三九年开始担任辅仁大学的课程，一九四二年以后，主要在辅仁大学任教(全国解放后，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一九五三年来到天津师范学院(后改为河北大学)，在这里一直工作到去世。

父亲学识渊博，再加上他对青年学人的关注和爱护，在大学里，他始终是一位受欢迎和爱戴的教授。当年就读于燕京大学的学生回忆当时情况时说：“顾先生的讲课像海绵吸水一样吸引着学生。燕京当时是学分制，每学期学生要选课，课程表一贴出来，顾先生的课同学们争着选，很快就满员了。每到上课的时候，没有选上顾先生课的学生就搬着小凳来听讲，不少人甚至就坐在窗台上。”

父亲讲授古典韵文的独有特色，而今任教于加拿大的叶嘉莹教授有专文《羨季师之教学》加以记述，她说：“羨季师讲诗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特别富于启发性。正如其它学长所曾指出的，凡是书本上能找到，学生自己可以阅读的，羨季师都不讲。羨季师所讲授的，是他自己以其博学敏感和深思，以及由于丰富的创作经验，所体会和掌握到的诗歌中真正的生命与妙义之所在，并且能够用多种比喻和例证，将这种生命和妙义做最细致最

深入的传达。”她还说：“举例来说，有一次羨季师来上课，步上讲台后，一语未发，便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三行字：‘自觉、觉人；自利、利他；自渡、渡人。’初看起来，这三句话似乎只是就为人与学道而言，好象与学诗并没有什么关联，可是羨季师却从此引发出了不少论诗的妙义。……羨季师由此所首先阐明的就是诗歌之主要作用是在于使人感动，所以须要有推己及人与推己及物之心。羨季师以为必须先有了民胞物与的同心，然后才会具有多情锐感的诗心。于是羨季师便又提出说伟大的诗人必须有将小我扩而为大我之精神，而自我扩大之途径或方法则有两端，一则是对广大的人世的关心，一则是对广大的自然的融入；于是羨季师遂又举引出杜甫《登楼》一诗之‘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为前者之代表，陶渊明饮酒诗中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后者之代表；而羨季师由此遂又推论及于杜甫与陆游及辛弃疾之比较，以及陶渊明与谢灵运及王维之比较；而由于论及诸诗人之风格意境之差别，遂又论及诗歌中之用字、遣词和造句与传达之效果的种种问题，甚且将中国文字之特色与西洋文字之特色做相互之比较，更由此而论及于诗歌中之所谓‘锤炼’和‘酝酿’的种种工夫。由此可以层层深入地带领同学们对于诗歌中最细微的差别做最深入的探讨，而且绝不凭借或袭取任何人云亦云的现成说法，总是以他自己多年来亲自研究和创作的心得和体验，为同学们委婉深曲地做多方之譬说。昔元遗山论诗绝句曾有句云：‘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羨季师在讲课时，其联想和引喻之丰富和生动，就正有类于是。所以羨季师之讲课，真可以说是飞扬变化，一片神行。”

几十年的教书生涯，父亲的学生遍于山南海北，他虽然受到学生的崇敬与爱戴，但他最反对学生囿于老师的门户，局限于传统的见解。他对于青年学子的新鲜见解，抱着热诚的期待。他在《东坡词说》的前言里，就读东坡词的问题，曾谈及读书和求师的方法：

……每一首，首宜速读，以遇其机，次则细读，以求其意，最末掩卷思之，以会其神，必有好有不好（按：“好”读去声），有解有不解，然概念既得，好者解者无论矣，若其不好者亦勿弃置，不解者更不必穿凿，然后取吾之说，……彼苦水将奚以说耶？于是乃逐字逐句读吾之说，以相与印证焉，如是读为得之。

父亲对学生学业上的启发、引导、勉励是从他受教的学生们难以忘怀的。他的学生、著名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回忆说：

顾先生当年循循善诱，最不赞成学生“随人脚跟”“亦步亦趋”“师云亦云”，无所发明，无所前进；最喜欢青年学生提出不同的见解，常常引用禅宗的话头“见过于师，方可承受”来鼓励学人。相互启发、切磋，是顾先生引以为最大快乐的事情。这一种高尚的治学、为人的精神，给我的印象至极深刻，使我永难忘记。（《“刘勰及其文心雕龙评介”跋》，河北大学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对待教诲青年一代的工作，父亲一生始终勤奋认真、兢兢业业。一九五三年以后来到天津，已是他的晚年，对教学却是从没有丝毫懈怠过。每学期都要亲自选注教材，每周几千字的讲稿都是毛笔恭楷竖行写在稿纸上。他临终前的这六、七年，单是手写的讲稿就有“唐宋诗词”、“中国文学批评史”、“元代杂剧”、“明清小说”、“佛典翻译文学”、“毛主席诗词”等近十种上百万字。这本是他用平生最后的精力留给青年学人的一份遗产，却也毁于那一场浩劫了。

三

父亲虽然自幼喜读古诗，练习作诗却在十五岁以后，二十岁时开始填词，写小说则是二十多岁将近三十岁时的事。

二十年代中期，父亲参加了当时的文学团体“浅草社”，先后在《浅草》季刊和《沉钟》半月刊上以顾璫、葛茅的笔名发表小说《失踪》、《孔子的自白》、《母亲》等。《失踪》被鲁迅先生编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小说二集》。抗日战争期间，短篇小说《佟二》发表于《辅仁文苑》，这篇小说，曲折地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一九四七年，反映旧中国农村生活的

中篇小说《乡村传奇》发表于《现代文录》。

一九二七年，父亲的第一部词集《无病词》问世，一九二八年《味辛词》问世。二词集问世不久，《大公报·文学副刊》就发表论文评赞。接着，他又陆续印行了《荒原词》、《留春词》、《濡露词》、《霏集词》诸词集及《苦水诗存》等等。叶嘉莹教授在《羨季师之词作的主要内容》中说，这些词作“其一为对时事之感怀及喻托”；“另一类则是其表现有一种哲理的思致或人生观的作品”；“还表现有一类或使用新的语汇，或选取新的主题以表现新思想的作品。”对于第一类，叶先生以其《味辛词》为例：“如其‘湖边血痕点点，更血花比着暮霞红’（八声甘州·哀济南）以及‘不道好山好水，胡马又嘶风，地下英灵在，旧恨还重’（八声甘州·忽忆历下是稼轩故里，因再赋）诸作品中所表现的则是对于当年所发生的济南惨案的悲哀愤激的感慨。”对于第二类，叶先生写道：“一般说来，羨季师虽经常写有一些自叹衰病之作，这可能是因为在羨季师的体一向多病的缘故；而其实在精神方面，羨季师却是经常表现有一种积极的担荷和战斗之心志的。……而这种心志和情意，实在以在《荒原词》中表现得最为鲜明，也最为强烈。如其《鹧鸪天》一首之‘说到人生剑已鸣，血花染得战袍腥，身经大小百余阵，羞说生前死后名。心未老，鬓犹青，尚堪鞍马事长征。秋空月落银河黯，认取明星是将星。’可以说是表现这一类心志和用意的一篇代表作品。”对于第三类，叶先生举例说：“再如其《荒原词》中的一首《木兰花慢》之以‘赠煤黑子’为题，其词中曾有句云：‘豪英，百炼苦修行，死去任无名。有衷心一颗，何曾灿烂，只会怍怍。堪憎破衫裹住，似暗纱笼罩夜深灯。’以及其《味辛词》中的一首《木兰花慢》之以‘卜者午夜吹笛，怆然有触予怀也’为题，其词中曾有句云：‘有谁将命运，双肩担起，一手全操。’这些作品便都是选取了旧传统之词作中所从未选取过的主题，也表现了旧传统中所从未表现过之情意的作品。这对于词的创作而言，是一种值

得重视的尝试和开拓。”

父亲的词在三、四十年代传诵于词坛。俞平伯先生在为父亲《积木词》所作的序中评价父亲的词：“若夫羨季之词则所谓不托飞驰之势，而芬烈自永于后者。”又说：“其昔年所作，善以新意境入旧格律，而《积木》新词则合意境格律为一体，固缘述作有殊，而真积力久，宜其然也。”（《燕郊集·积木词序》）

父亲的词作在词坛虽已久负盛名，但新中国成立后，他步入新社会，接受马列主义，思想精神面貌为之大振，对早年的创作却多感不足，不愿意再版或出版。当友人或学生提起他早年的词作时，他总是笑着说：“呵，呵，咱们不谈过去的词了，还是听我的新作吧！”于是接着就兴奋地朗诵起他的新词。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填词作诗共数百首，散见于各报刊。这些诗词笔酣墨饱，满宫满调，又通俗易懂，热情洋溢地歌颂了新中国的新面貌。父亲将解放后的新作自编为集，题名《闻角词》。在《闻角词题记》中说：“卅年前读尹默师《秋明集》，其‘破晓’五律一首发端即曰‘破晓闻清角’，甚喜之，至今弗能忘，固名吾词曰‘闻角’。角者，号角也。建设事业，云蒸霞蔚，一日千里，每读报未尝不鼓舞奋发，譬闻角声，号召前进。词名‘闻角’，是其义也。”他摘取了沈尹默先生的旧作，借来题集，又赋给它以新含义，这是父亲晚年受到革命事业鼓舞奋发励前的表现。

四

父亲一生从事古典韵文特别是词曲方面的研究，几十年来，著述颇多。

父亲研究古代词曲并取得成就，他的治学道路，有自己的特点：

重视古典文艺理论和西方文艺理论。父亲精通我国古代的艺术理论，研究《文赋》、《文心雕龙》都有论文发表，对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更是推崇备至，早年曾写过《人间词话笺义》一

书。在他攻读西方文学的时候，接触研读了西方的理论。这就使他在研究工作中，运用中外文艺理论进行分析评论，得心应手，左右逢原。

重视创作。父亲进行研究工作，又十分重视创作，他认为没有艺术实践的人，研究作家作品、进行艺术分析总是隔着一层；搞些创作，有了一些艺术实践，至少可以晓得此中甘苦，至少可以了解作家的创作过程。父亲一生始终没有放下创作的笔，而他对古代作家作品的分析研究也往往是从作者的构思和思想感情入手的。从他受教的学生，现在也深深感到了能创作对研究确实大有好处。父亲不仅填词治曲，而且校订辑补古代杂剧，著有《元明残剧八种》。

重视考据。父亲认为对古代作家作品的研究与对它们进行考据是密不可分的，离开了考据，分析研究也就失去了科学性。父亲三十年代在进行元曲研究的同时，也对元曲进行了大量的考据。他重视前人考据的成果却决不人云亦云。他的考据分两个方面，一是历史方面的，一是语言方面的。他的《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考证了关汉卿这个重要作家生活的时代，描绘了当时时代的特点，这对于研究关汉卿的生平、思想、创作有重大意义。他对于元曲中词汇的解释曾发表过一组文章，如《元曲中方言考》、《元曲中复音辞演变之公式》等等。他是作元曲词汇方面考证工作比较早的一个。这些考据使他的元曲研究有创见、有坚实的基础。

重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比较。父亲知识广博，他认为文学现象从来不是孤立的，因而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他都有兴趣阅读，这就使他的研究触类旁通，游刃有余。他在早年就曾以《窦娥冤》与《罗密欧与朱丽叶》进行比较；他的《朗诵了〈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后写给中文系三年级的一封公开信》是以杜甫的“咏怀五百字”与屈原的《离骚》进行对比；他死后才发表的《彷徨与离骚》一文更将鲁迅先生的作品与屈原的著名辞章联系。晚年他还细字密书评点长诗《漳河水》，探讨它是如何继承

发展了古代诗歌的艺术手法。

正是由于这些特点，才形成了父亲治学研究的独特的道路。他写于四十年代的《稼轩词说》、《东坡词说》正是体现了这些特点的两部专著。周汝昌先生一九四四年为这两部书写的“钞校后记”，将此两书誉为“实乃人间词话后第一伟著”。

对于古典韵文的研究，父亲十分注意进行艺术分析。他讲究作品的文彩，但认为这文彩“并非脂粉薰泽之谓”、“脂粉薰泽皆自外铄，模拟袭取，非文彩也”。他说“文彩必须于文字上具炉锤，能驱使”。因此，他借用“小学家”论“小学”的形、音、义三者来谈文字上的锤炼。他说：“曰义者，识字真，表意恰是，此尽人而知之矣。然所谓识字，须自具心眼，不可人云亦云。否则仍模拟，非文彩也。曰形者，借字体以辅义是。故写茂密郁积，则用画繁字。写疏朗明净，则用画简字。一则使人见之，如见林木之蓊郁与夫岩岫之杳冥也。一则使人见之，如见月白风清，与夫沙明水净也。曰音者，借字音以辅义是。故写壮美之姿，不可施以纤柔之音，而宏大之声，不可用于精微之致。”而形、音、义三者的作用全在于“助意境之表达”。因此这三者“是三非一”、“即三即一”，这“一”就是“合为意境而已”，“视之而覩其形，诵之而听其声，而其义出焉”。“听其声而其形显，而其义出焉”。那么这就不仅是艺术手法、艺术欣赏的问题，实际早已关系到作品的内容了（以上引文均见于《稼轩词说》卷首）。对于古典词曲，父亲时常使用这种方法进行分析、评论。

父亲不仅致力于古典韵文，对于佛学也颇为精通。汉魏以后，佛教与中国文化关系很深，对中国文化影响很大。父亲为深入研究中国文学而读了大量佛教典籍，他深入地了解了禅宗和文艺理论的关系，把禅家的精神——传达、表现方法及其境界——运用来解说我国古典韵文的高超特色。四十年代中后期，他写了表面是谈禅实际是讲文理和禅理相通的专著《揣籥录》。禅理是深奥的，枯燥的，可是他结合着古代韵文的研究，写得生动流利，

正如父亲自己所说，已经不像谈禅而是写散文了。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他在大学里开了“佛典翻译文学”课，又写了《佛典翻译文学》一稿。佛教典籍中有文学意味的作品不少，而系统介绍的却不多见，父亲这部著作无论选文还是解说都很精当，在这方面，可说是一个草创吧。

父亲长于书法，包括楷书与草书，特别是草书。他的书法是师承沈尹默先生的。晚年他还进行书法理论的研究，曾著《章草急就章系说》，遗憾的是这部未完成的遗稿今天也不知去向了。

父亲在世仅仅六十四个头，长年疾病缠身，更有时大病在床。他之所以能在教书之余，取得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我想这与他的治学精神、治学态度是分不开的。

父亲一生学习研究十分刻苦。他从小养成读书的习惯，读书写作成为他一生最大的乐趣。父亲长年腰酸腿疼，北京天津的盛夏三伏天气，他也是身不离毛围腰，腿不离毛护膝，冬天就更不用说了，但他长年伏案书写，实在疼楚难忍时就叫我们给他捶捶腰，捏捏腿。他写作《稼轩词说》时的情况是：“自吾初著笔为此说，时在中伏，日长天暑，今虽立秋，仍在三伏，秋老虎之余烈未尝稍减。吾之病躯虽较旧时为健，而苦思久坐，头之眩，腰之楚，亦屡屡迫我停笔卧床。至于挥汗如雨，倦目生花，可无道矣。”（《稼轩词说》词目后记）父亲经常是在这种身体状况下从事著述的。从我记事的时候起，父亲给我的印象就是每天不是看书就是写字。当重病不得不卧床时，他或闭目吟诗，或用手指在被上划字，所以每当卧床几日以后，必然是：一、多首新词问世；二、书法上又有了创新。

父亲一生在学术上是以乐观的、满怀信心而又永不停息的精神在探索着。他的《和陶公饮酒诗二十首》中有句云：“知足更励前，知止以不止”，正反映了他这种探索精神。他说：人应该知足，不应在物质上、获得上追求不已，贪得无厌。但如果知足不求进取了也是不对的。光是知足往往造成一个人的颓废、懈怠，

所以知足并不意味着消极、不长进。要找到一个精神上的立脚点，为的是不停的前进。父亲一生在生活待遇上始终满足，在学术上总是把已取得的成就作为继续进取的激励。他一生以这种精神进行工作，始终对自己的研究工作充满了信心。

父亲虽然是个知名教授、学者，但他却十分谦虚。对于自己的学问，他常半开玩笑地自谦为“马二先生之学”；每有新作或新著，总是首先抄寄友人、学生，请他们修改。对于自己的著作，他风趣地说：“吾文现在，赃证俱全，一任横读竖看，薄批细抹，印可棒喝，苦水无不欢喜承当。”（《东坡词说》前言）又说：“如读吾说，则遂谓其铁案如山，苦水并不喜欢，只有叫屈，诚如是，苦水将置学人于何地，学人又将何以自处乎？”他听不惯吹吹拍拍、阿谀奉迎，常常因为有人当面奉承而引得他大发脾气。

五

在古代典籍面前，父亲是个学者、研究家，但对于祖国，他却终生都是一个忠诚的赤子。

父亲爱国思想的萌芽是在上小学的时候，父亲曾回忆说：“那时清河县城高等小学堂的‘监督’（校长），是一位曾短期赴日本学习过的留学生，思想比较新，正是从这位监督那里，我开始知道一个国民应当爱国，应当关心国家的命运。”当他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正值“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爆发，父亲终生以能亲身经历“五四”运动而自豪；北京解放后的第一个五月四日，父亲还曾在辅仁大学作报告，讲当年的“五四”运动。

父亲一生十分尊崇鲁迅。在为人上、思想上、治学上，父亲都学习鲁迅并以鲁迅的伟大精神教育年轻的一辈。二十年代父亲担任中学教师的时候，经常给学生讲鲁迅的作品和北欧、日本的作品，引导学生接触新思想。不少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学生，都把父亲当年的讲课作为最初的“启蒙”，至今，他们对当年父亲讲鲁迅作品的情景，仍是记忆犹新。一九四六年在“中国语文诵读

座谈会”上，父亲特别朗诵了《阿Q正传》，这次朗诵朱自清先生在《论诵读》一文中曾有记载，并给以很好的评价（见《朱自清文集》三）。一九五六年父亲还为天津市作了纪念鲁迅的报告。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很多大学相继内迁，由于家庭的拖累，父亲不得不仍留北平，在两所教会大学燕京和辅仁任教。他忧心国事，每当报载某地某地又相继失守的消息时，他第二天走上讲堂，总要含蓄而深沉地说：“昨天晚上，我没有睡好，写了几首词，……我不讲了，你们会看得明白。”说完就长叹一声把新词奋笔疾书于黑板。学生看了词，理解老师的心情，理解老师的思想，也和老师一起陷入深深的悲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被迫关闭，当时的北平只剩一所辅仁大学不向敌伪当局注册，不领取敌伪政府的津贴。尽管当时全家只靠父亲一人工作，生活很困难，但父亲坚持只在辅仁一校任教，决不接受伪北大的聘书。父亲当时对我的姐姐说：“那里我是不能去的，这一脚要是淌进浑水里，爸爸这一辈子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当时父亲十分苦闷而又无处诉说，一九四一年他在杂剧《馋秀才》中写了一个宁肯穷得教村学却无论如何不肯去侍候县太爷的秀才，我想，这恐怕是父亲对自己心迹的一种曲折而隐晦的表露吧。剧中有这样两支曲子：

[倘秀才]又不会成群结党，又不会拈斤拨两，那奔走钻营也并非所长。既不能赔笑脸，又不肯唱花腔，凭什么论功邀赏？

[滚绣球]我若是拿得动刀，我若是抡得动枪，到得那两军阵上，我也去入伍吃粮。恨老天，怨彼苍，不给我力量，只生来赋予清狂。倒垂金盞悲还壮，碎地胡琴慨以慷，空孤负一貌堂堂。

这两支曲子流露出父亲不能身赴国难的苦衷，也表现出他不肯颯颜事敌的堂堂正气。

八年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在沦陷区苦度了八年的父亲，兴奋心情是难以名状的。但他接着就目睹了国民党政治的黑暗与腐败，兴奋很快又变成了失望，他感到国家再没有前途，只能埋头书

斋不问世事。记得有一天晚饭后，他叫我用一张墨绿色的厚纸、一根竹签给他做成一面小旗，他提笔蘸墨在小旗上横排写了“只图遮眼”四个字，摆在书桌前面的窗台上，坐在桌前，小旗正好遮住了外望的视线。及至年龄稍长，我才明白，父亲的意思是借此挡住视线，一举双关，遮住窗外黑暗、腐败的社会，他再也不忍心去看那满目疮痍的祖国了。

正当父亲被失望、苦恼萦绕着的时候，党的地下组织对父亲的关怀，象一线阳光透过周围的黑暗世界照射进父亲的生活里——解放区的《晋察冀日报》裹进国民党的报纸里寄到了父亲的手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装上周作人《秉烛后谈》的封面，父亲也收到了。这些报刊、书籍使父亲感到又有了奔头，又有了活力。他的《驼庵小令》中有一首北曲〔醉太平〕，曲折风趣地写出了他当时的心情和感受：

守残编断简，远绿水青山。穷生活压不扁瘦双肩。有些儿病缠。
怕腰疼吃一剂追风散，防脑昏用一付头疼片，祛食积吞几粒健肠丸——且将心放宽。

党的地下组织不只在政治上关心着父亲，连我家在通货膨胀中的贫窘生活也想到了，一笔款项巧妙地送到我们家里，使我们一家度过了生活上的难关。

党的关怀、爱护、信赖，使父亲那一颗久处黑暗、阴冷社会中的心复甦了。正因为如此，解放大军开进北平，文化古都和平解放的时候，父亲的欣喜鼓舞之情是可以想见的。解放了，真正解放了，父亲的心也解放了。父亲好象一下子变了一个人，我从小听惯了他的长吁短叹，看惯了他的眉头紧蹙，这时，才看到了他脸上的笑容，听见了他兴奋的笑语，他连脾气也变得慈爱温和了。大半生把自己关在书斋的父亲步出了书斋：四九年，他参加了辅仁大学教职工联合会的政治学习会；他承担了辅仁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工作；他兼任了辅仁大学校务委员会的职务。他大量地阅读政治书籍和苏联文学作品，甚至连解放前惯用的笔名“苦水”

也从他的作品中消失了。

五十年代中期，他当选为河北省人民代表，天津市政协委员。一九五五年，当他从信上得知我十九岁被批准加入党组织的时候，高兴得连夜写了一首七律寄给我。其中的一句是“偏小偏怜偏进步”。这在父亲对女儿的祝贺里，包含着对党多么深厚浓重的感情啊！一九五九年，在庆祝党的生日的大会上，他郑重地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

一九六〇年春，父亲开始卧病在床，到八月份，他已经经常处于昏迷之中。我守候在他身边，当他稍稍清醒一点的时候，就断断续续地向我说上几句话。第一次他说：我一生没见过共产党这么好的党，你们要听党的，跟着党走。第二次他说：我一辈子吃了身体不好的亏，你们可要炼好身体。最后一次他说：我是个有旧思想的人，个人主义太重，入党申请提得太晚了，你们不要学我。除此之外，父亲在弥留之际，就再也没有留下什么遗言。

一九六〇年九月六日下午四时，父亲在病床上安详地睡去了，从此再没有醒来，他带走了没有来得及写出的著述腹稿，但大量论著、作品留在人间，亲手栽培的桃李已蓊郁成林，这当是父亲奉献给祖国、人民的一颗赤子之心罢。

一九八一年四月

后记 写一点纪念父亲的东西是我久藏心底的宿愿。但就我的学识、水平，要写出父亲做为学者、教授、作家的一生是力所难及的。这次草拟此稿，父亲生前的友好和学生冯至、卢季韶、周汝昌、吴晓铃、史树青、王振华、韩文佑、葛信益、郭预衡、杨敏如、张中行诸位先生，给了我热心的帮助和指教，远在加拿大的叶嘉莹先生更特地撰写了《羨季师之教学》等专文寄来，在此，一并致以深挚的谢意。

之 京

顾随著作目录

一、专 著

元明残剧八种(附录一种) 燕京学报第22期, 1937年12月, 并有燕京学报单行本。

稼轩词说 1947年连载于天津民国日报。

东坡词说 1947年连载于天津民国日报, 英译本刊于香港中文大学编《译丛》第11、12期合刊(1979年), 译者 Huaug Kuo-pin Teresa Yee-wha Yu。

揣籥录 1947—1948年连载于佛学刊物《世间解》1—10期。

两汉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典翻译文学 河北大学学报 1980第3期。

二、论 文

读元人杂剧辑佚 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44期, 1936年4月23日

跋赵景深先生读曲随笔 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52期, 1936年6月11日

元曲中方言考 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 1936年6月17日—10月29日

关于元人杂剧辑逸 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55期, 1936年7月2日

夜漫漫斋读曲记 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60期, 1936年8月6日

关汉卿不是金遗民 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75期, 1936年11月19日

元曲中声形容词之两公式 中央日报文史副刊12期, 1937年2月7日

元代四折以上之杂剧 中法月刊10卷5期, 1937年3月

评读曲随笔 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92期, 1937年5月26日

元曲中复音词演变之公式 经世日报读书周刊44期, 1947年6月18日, 亦见于辅仁大学《语文学会讲演集》第一辑

麻花、油炸鬼、饅子及其他 辅仁大学《语文学会讲演集》第三辑

不登堂看书外记(论《水浒》、《说岳》、《西游记》、《小五义》等小说) 连载于1948年华北日报文学副刊

朗诵了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以后写给中文系三年级同学的一封信 天津师范学院“教学与科学研究通讯”1957年5月10日

论关汉卿“诈妮子调风月”杂剧 天津师范学院“教学理论与实践”1959年第一集

关汉卿和他的杂剧 河北日报 1958年6月29日, 收入中国戏剧出版社《关汉卿研究》第一辑。

东临碣石有遗篇——略谈曹操乐府诗的“悲”、“哀”、“壮”、“热” 河北日报 1959年4月12日

文心雕龙夸饰篇后记(上、中、下) 河北日报1959年6月7日、6月14日、6月21日。

曹操乐府诗初探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

彷徨与离骚 新港 1961年9月、10月合刊

刘勰及其文心雕龙评介 河北大学学报 1979年第1期

三、创作

词曲：

无病词 1927年出版

味辛词 1928年出版

荒原词 1930年出版

苦水诗存·留春词 1934年出版

苦水作剧 1936年出版

霰集词1941年出版

俊秀才(杂剧) 《辛巳文录》初集, 1941年10月

濡露词(附倦驼庵词稿) 1944年出版

苦水作剧二集 1945年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创作旧体诗词数百首, 散见于各报刊, 自编为《闻角词》。

小说：

失踪(笔名顾瑾) 《浅草》第1卷第4期 1925年2月, 收入鲁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孔子的自白(笔名葛茅) 《沉钟》半月刊第5期, 1926年10月

母亲(笔名葛茅) 《沉钟》半月刊第8期, 1926年11月

乡村传奇 《现代文录》, 1947年

佟二 《辅仁文苑》

